

文化的差异和沟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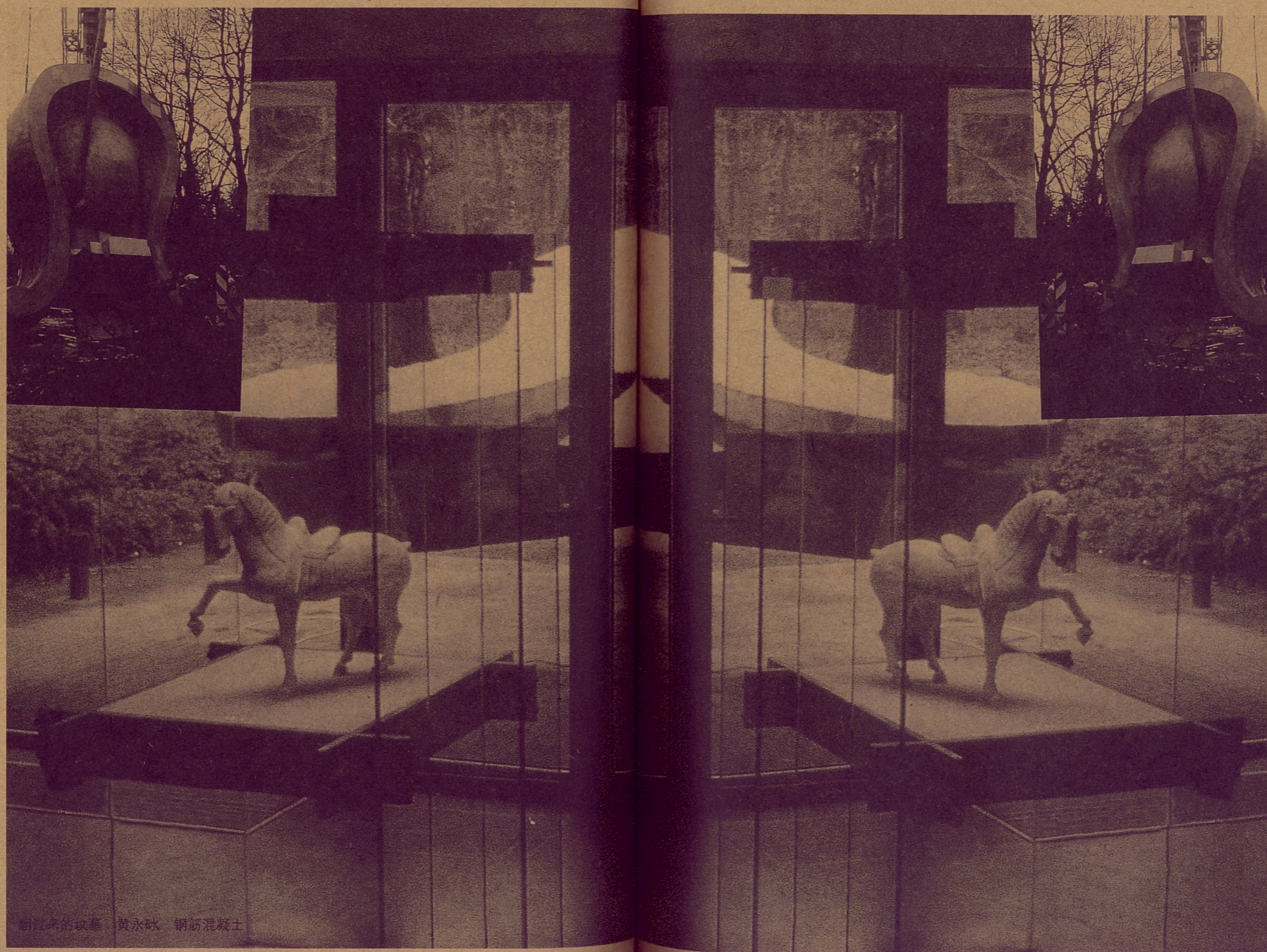
黄永砅(及让·皮埃尔·伯特兰)现代表法国参加今年(1999)的威尼斯双年展。自1989年6月参加了“大地魔术师”展之后,这位中国艺术家便留居在巴黎,很快在国际艺术舞台的重建过程中,成为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这次法国展馆的艺术家筛选策略很有意义:它似乎在与“民族艺术”的倡导精神背道而驰。而对法国当代艺术创作中的多元文化表示鼓励和理解。对于中国前卫艺术群体而言,革新艺术和文化的结构体系以创建新的文化身份是他们的主要目的。黄永砅是第一位将达达精神的前卫观念引进中国文化语境的艺术家,他以及厦门达达群体便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倾向。这一思想倾向使他的“反艺术”精神得以形成,从中国人代代相传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甚至是生存方式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西方在当代艺术和文化中的统治地位,并开始从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当代艺术的理性的、传统的艺术表达方式之间寻找独特的、策略的调解方案。置身于西方,他的作品批判了西方现实中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诸多主要方面,并在其中找到了他自己。他在作品中引入了中国古代的“占卜易经”,不仅暗示宇宙、世界和人类的文化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也为了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策略的选择,以挑战西方对真理的定义以及其对于世界的精神统治。作品《四轮转盘车》(1987)正是这种思想的结果。作品中他使用各种不同的物体,而不必对此行为作出解释或者控制其结果。如果西方的实质就是现代,而东方的定义就是传统、前现代,那么,重新阅读这两种文化意味着对西方话语的批判,同时,也等于宣布了传统与现实之间存在的不同关系和矛盾。这种认识以及《大转盘》的指导方针促使黄永砅于1987年把王抱明的《中国历史》和赫伯特·里德的《现代绘画史》扔进洗衣机内,搅动两分钟直到成为一团纸浆。这种带有转型意味的过程使他从物质和象征意义上触动了文化和历史的根基,借以消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建构起来的类别等级。1990年,他用书和报纸制成的纸糊,“包扎”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上的“伤口”;次年,匹茨堡的卡内基艺术博物馆里,他“洗涤”了一整排书,甚至把二十多套博伊斯、库奈里斯、库奇、基弗的经典著作,连同目录册,一起

◎ 依芙琳·约安洛
——兰丽译

扔进“呕吐堆”,作为对世界艺术的超级大师们所拥有的政治话语权力采取的质询方式。黄直接攻击西方日常的或政治的现实,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材料被放到了他的艺术语言之中,包括米饭、中药甚至是鲜活的动物和昆虫都用作了不同种族群类的隐喻。米、动物、昆虫这些构成中国日常现实的基本部分,用以组成他的整个语言体系——象征、信仰、社会和天人合一的道德信条,或世

界与基本元素之间的和谐。相反,西方思想中的自然,自古希腊以来,则一直是较之于“文化”或“文明的人性”的异端。因此,“自然”(米、动物)以其传统的和文化的内涵成为艺术在西方结构语境中的再现,是极具颠覆意义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挑衅行动。黄永砅作品的特点之一在于其变幻无常:实际上,大多数的作品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展览过程中,米慢慢地开始

分解,昆虫到处乱飞,相互吞食,等等)。这种富于变化的性质揭示了一个十分具有启发性的思想:颠覆性行为正在颠覆当代艺术和它所建构起来的定义。过去的几年里,黄永砅探索着如何“自然地”进入到多元文化的冲突和文化压制所产生的时事事件中。这方面,有《通道》(1993),极有意思,标志着这一倾向的开端。做这个装置时,艺术家“重新修建”了格拉斯哥机场的护照检查口,最后加上“欧共体”和“他国”的标识牌。其目的是要质询,当今世界出现民族和文化的边界线意义何在。其实,黄永砅事先已经把一对狮子关在笼子里,放置于两个入口之下——它们才应该是真正的守卫,以象征阻碍和控制“他国”人自由的权力。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帐篷装置中,观者被迫目睹成千的蝗虫与几十只蝎子之间的战斗。借此,他直接对殖民主义者对待亚洲人(黄的意义在中文中与“蝗虫”谐音)的态度进行了挑战。但最具象征意义的作品应数他的《世界剧场》(1993)。在一个龟形竞技场,龟——中国传统中象征和谐与和平的动物,他把成千上万的不同类型、生长于不同地方的昆虫聚集在一起,用以隐喻民族之间的冲突。“我认为,冲突比和谐更重要,冲突带来新鲜感,事实证明,它促成了历史的前进,世界的变化。”这件作品挑起真正的政治和文化冲突,并在蓬皮杜的《超越界限》展览中受到审查。在政治文化冲突和变化的重要时期,黄永砅的求变、超越场境,以揭示出现实的精神显得更为有效和重要。例如,1994年在纽约,他把新博物馆的入口转变成了一个自动洗衣间,让人忆起美国的首批中国移民的历史,以及伴随着他们的种族话语(《中国手洗衣店》《大限》(1997)中,三个巨大的土碗印满洋人的痕迹:昔日欧洲租界在远东留下的印记,碗里盛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这些食物必须在1997年7月之前消受。这一装置,直接提醒观者,一种文化在即将失去其最后的殖民地之时,它所笼罩的历史背景。黄永砅面对拥有自己历史的西方土地,重新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神话(如为卡提尔基金所作的《羊祸》1997)他分析并解构了他们的文化基础。这正是我们可以铭记的文化差异、文化沟通、人和自然的排斥与并存等等的地域解构和地域重构事件。这些已经成为当代全球性现实的基本事件。



浙江的装置 黄永砅 钢筋混凝土